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者文选

季羨林集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季羨林先生遺著

季羨林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季羨林 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季羨林集/季羨林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ISBN 7-5004-2841-3

I. 季… II. 季…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②季羨林-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7415 号

责任编辑 李树琦

责任校对 林福国

版式设计 李 勤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1201 印刷厂

装 订 小月河装订厂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875

插 页 2

字 数 318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

1999年11月14日

编者的话

季羨林先生 1911 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1930 年就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 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1941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 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8 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担任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羨林文集》，共有二十四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吐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

季羨林早年既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受新文化运动洗礼，后又留学德国接受西方学术训练。回国后，献身东方学，开拓国内东方学研究园地。凭借深厚的学养，在学术研究中融古今东西于一炉，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他一生勤奋治学和写作，兼学者、翻译家和散文家于一身。本书限于体例，只能选收他的学术论

文。而他的治学范围很广，本书限于篇幅，选收的论文也只能侧重在他的研究重点：佛典语言研究、中印文化关系研究和梵语文学研究。

关于季羨林的治学思想，读者可以直接阅读收入本书的《我的学术总结》一文，我在这里可以简略地提示三点：一、坚持学术贵在创造的信条。每篇论文都有学术新意，或提出新见解，或提供新材料，以填补学术空白、攻克学术难点为己任，以重复前人劳动（“炒冷饭”）为学术研究大忌。二、重视考证。提出新见解不是靠主观臆想，而要以材料为依据。观点出自材料。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因此，在搜集材料方面，要有“竭泽而渔”的气魄，而在辨析材料方面，又要有“如剥春笋”的精神。三、追求“彻底性”。许多学术问题不是靠一两篇论文就能彻底解决，而是需要不断发掘新材料，加以验证、修订、充实和完善。以“彻底解决”为理想目标，对有些学术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势必会终生抓住不放。

最后要说的是，本书中的引文和注文涉及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英文、德文、法文等多种语言以及古汉语，排版和编校加倍辛苦。在此，我谨代表季羨林先生，向参与本书排版和编校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黄宝生

目 录

编者的话	(1)
浮屠与佛	(1)
再谈“浮屠”与“佛”	(16)
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32)
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	(63)
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问题的补遗	(72)
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	(76)
〔附〕对《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 的一点补充	(94)
cīnī 问题	
——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	(100)
再谈 cīnī 问题	(111)
列子与佛典	
——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	(114)
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	(127)
《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	(137)
印度文学在中国	(145)

《十王子传》浅论·····	(163)
《沙恭达罗》译本序·····	(178)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198)
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兼评美国梵文学者弗兰克林·爱哲顿的方法论 ·····	(208)
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235)
吐火罗文 A 中的三十二相 ·····	(282)
梅呾利耶与弥勒·····	(308)
佛教的倒流·····	(321)
我的学术总结·····	(361)
作者主要著作目录·····	(400)
作者年表·····	(401)

浮屠与佛

“浮屠”和“佛”都是外来语。对于这两个词在中国文献中出现的先后问题是有过很大的争论的。如果问题只涉及这两个词本身，争论就没有什么必要。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它涉及中印两个伟大国家文化交流的问题和《四十二章经》真伪的问题。所以就有进一步加以研究的必要。

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成了正等觉以后的名号梵文叫做 Buddha。这个字是动词 budh（觉）加上语尾 ta 构成的过去分词。在中文里有种种不同的译名：佛陀、浮陀、浮图、浮头、勃陀、勃驮、部多、部陀、毋陀、没驮、佛驮、步他、浮屠、复豆、毋驮、佛图、佛、步陀、物他、醇陀、没陀等等，都是音译。我们现在拣出其中最古的四个译名来讨论一下，就是：浮屠、浮图、复豆和佛。这四个译名可以分为两组：前三个是一组，每个都由两个字组成；第四个自成一组，只有一个字。

我们现在先讨论第一组。我先把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所构拟的古音写在下面：

浮 * b'ïög/b'ïeu/fou (Bernhard Karlgren: *Crammata Serica*,
reprinted from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number 12, 1940, p.449, 1233

i)

屠 * d'o/d'uo/t'u (同上, pp.136—137, 45i')

图 * d'o/d'uo/t'u (同上, pp.143—144, 64 a)

复 * b'iök/b'iuk/fu (同上, p.398, 1034 d)

豆^[1] * d'u/d'əu/tou (同上, p.158, 118 a)

“浮屠”同“浮图”在古代收音都是-o, 后来才转成-u; “复豆”在古代收音是-u, 与梵文 Buddha 的收音-a 都不相当。梵文 Buddha, 只有在体声, 而且后面紧跟着的一个字第一个字母是浊音或元音 a 的时候, 才变成 Buddhō。但我不相信“浮屠”同“浮图”就是从这个体声的 Buddhō 译过来的。另外在俗语 (Prakṛta) 和巴利语里, Buddha 的体声是 Buddhō。(参阅 R.Pischel, Grammatik der Prakrit-Sprachen, 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 I.Band, 8.Heft, Strassburg 1900, § 363 及 Wilhelm Geiger, Pali, Literatur und Sprache 同上 I.Band, 7.Heft, Strassburg 1916, § 78) 在 Ardhamāgadhī 和 Māgadhī 里, 阳类用-a 收尾字的体声的字尾是-e, 但在 Ardhamāgadhī 的诗歌里面有时候也可以是-o。我们现在材料不够, 当然不敢确说“浮屠”同“浮图”究竟是从哪一种俗语里译过来的; 但说它们是从俗语里译过来的, 总不会离事实太远。

说到“复豆”, 这里面有点问题。“复豆”的古音既然照高本汉的构拟应该是 b'iuk-d'əu, 与这相当的梵文原文似乎应该是 * bukdu 或 * vukdu^[2]。但这样的字我在任何书籍和碑刻里还没见到过。我当然不敢就断定说没有, 但有的可能总也不太大。只有收音的-u 让我们立刻想到印度俗语之一的 Apabhraṃśa, 因为在 Apabhraṃśa 里阳类用-a 收尾字的体声和业声的字尾都是-u。“复豆”的收音虽

然是-u, 但我不相信它会同 Apabhraṃśa 有什么关系。此外在印度西北部方言里, 语尾-u 很多, 连梵文业声的-am 有时候都转成-u [参阅 Hiän-lin Dschi (季羨林), Die Umwandlung der Endungam in -o und -u im Mittelindischen, Nachrichten vo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Philolog.-Hist.Kl.1944, Nr.6.]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 “复豆”很可能是从印度西北部方言译过去的。

现在再来看“佛”字。高本汉曾把“佛”字的古音构拟如下:

* b'iwət/b'juət/fu (Grammata Serica, p.252, 500 1)

一般的意见都认为“佛”就是“佛陀”的省略。《宗轮论述记》说: “‘佛陀’梵音, 此云觉者。随旧略语, 但称曰‘佛’。”佛教字典也都这样写, 譬如说织田得能《佛教大辞典》页一五五一上; 望月信亨《佛教大辞典》页四四三六上。这仿佛已经成了定说, 似乎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说法当然也似乎有道理, 因为名词略写在中文里确是常见的, 譬如把司马长卿省成马卿, 司马迁省成马迁, 诸葛亮省成葛亮。尤其是外国译名更容易有这现象。英格兰省为英国, 德意志省为德国, 法兰西省为法国, 美利坚省为美国, 这都是大家知道的。

但倘若仔细一想, 我们就会觉得这里面还有问题, 事情还不会就这样简单。我们观察世界任何语言里面外来的假借字 (Loanwords, Lehnwörter), 都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的现象: 一个字, 尤其是音译的, 初借过来的时候, 大半都多少还保留了原来的音形, 同本地土产的字在一块总是格格不入。谁看了也立刻就可以知道这是“外来户”。以后时间久了, 才渐渐改变了原来的形式, 同本地的字同化起来, 终于让人忘记了它本来不是“国货”。这里面人们主观的感觉当然也有作用, 因为无论什么东西, 看久了惯了, 就不会再觉得生疏。但假借字本身的改变却仍然是主要原因。“佛”这一个名词是随了佛教从印度流传到中国来的。初到中国的时候,

译经的佛教信徒们一定想法完全保留原字的音调，不会就想到按了中国的老规矩把一个有两个音节的字缩成一个音节，用一个中国字表示出来。况且 Buddha 这一个字对佛教信徒是何等尊严神圣，他们未必在初期就有勇气来把它腰斩。

所以我们只是揣情度理也可以想到“佛”这一个字不会是略写。现在我们还有事实的证明。我因为想研究另外一个问题，把后汉三国时代所有的译过来的佛经里面的音译名词都搜集在一起，其中有许多名词以前都认为是省略的。但现在据我个人的看法，这种意见是不对的。以前人们都认为这些佛经的原本就是梵文。他们拿梵文来同这些音译名词一对，发现它们不相当，于是就只好说，这是省略。连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说这个是“訛也”，那个是“訛也”，其实都不见得真是“訛也”。现在我们知道，初期中译佛经大半不是直接由梵文译过来的，拿梵文作标准来衡量这里的音译名词当然不适合了。这问题我想另写一篇文章讨论，这里不再赘述。我现在只把“佛”字选出来讨论一下。

“佛”字梵文原文是 Buddha，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在焉耆文（吐火罗文 A）里 Buddha 变成 Ptānkāt。这个字有好几种不同的写法：Ptānkāt, Ptānkte, Ptāmñkte, Ptānakte, Ptānikte, Ptānnakte, Pättānakte, Pättānnakte, Pättānkte, Pättāmñkte, Pättāmñakte。（参阅 Emil Sieg, Wilhelm Siegling und Wilhelm Schulze, Tocharische Grammatik, Göttingen 1931, § 76, 116, 122a, 123, 152b, 192, 206, 207, 363c）这个字是两个字组成的，第一部分是 ptā-, 第二部分是 -nkāt。ptā 相当梵文的 Buddha，可以说是 Buddha 的变形。因为吐火罗文里面浊音的 b 很少，所以开头的 b 就变成了 p。第二部分是 nkāt 是“神”的意思，古人译为“天”，相当梵文的 deva。这个组合字全译应该是“佛天”。“天”是用来形容“佛”的，说了“佛”还不够，再给它加上一个尊衔。在焉耆文里，

只要是梵文 Buddha，就译为 Ptānkāt。在中文《大藏经》里，虽然也有时候称佛为“天中天（或王）”（devātideva）^[3]，譬如《妙法莲华经》卷三，《化城喻品》七：

圣主天中王

迦陵频伽声

哀愍众生者

我等今敬礼 [《大正新修大藏经》（下面缩写为⊕），9，23c]

与这相当的梵文是：

namo'stu te apratimā maharṣe devātidevā kalaviṅkasusvarā |
vināyakā loki sadevakasminvandāmi te lokahitānukampi ||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edited by H. Kern and Bunyiu Nanjio, Bibliotheca Buddhica X, St.-Petersbourg 1912, p.169, L.12、13)

但“佛”同“天”连在一起用似乎还没见过。在梵文原文的佛经里面，也没有找到 Buddhadeva 这样的名词。但是吐火罗文究竟从哪里取来的呢？我现在还不能回答这问题，我只知道，在回纥文（Uigurisch）的佛经里也有类似的名词，譬如说在回纥文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Suvarṇaprabhāsottamarājasūtra）里，我们常遇到 tngri tngri burxan 几个字，意思就是“神中之神的佛”，与这相当的中译本里在这地方只有一个“佛”字。（参阅 F.W.K.Müller, Uigurica,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Preuss.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08, p.28、29 等；Uigurica II, Berlin 1911, p.16

等。)两者之间一定有密切的关系,也许是抄袭假借,也许二者同出一源;至于究竟怎样,目前还不敢说。

我们现在再回到本题。在 *ptānkāt* 这个组合字里,表面上看起来,第一部分似乎应该就是 *ptā-*。但实际上却不然。在焉耆文里,只要两个字组合成一个新字的时候,倘若第一个字的最后一个字母不是 *a*,就往往有一个 *a* 加进来,加到两个字中间。譬如 *atrā* 同 *tampe* 合起来就成了 *atra-tampe*, *kāsu* 同 *ortum* 合起来就成了 *kāswaortum*, *kālp* 同 *pālskāṃ* 合起来就成了 *kālpapālskāṃ*, *pār* 同 *krase* 合起来就成了 *pārrakrase*, *pālsāk* 同 *pāṣe* 合起来就成了 *pālskapāṣe*, *prākār* 同 *pratim* 合起来就成了 *prākra-pratim*, *brāhmaṃ* 同 *purohitune* 合起来就成了 *brāhmna-purohitune*, *ṣpāt* 同 *koṃ* 合起来就成了 *sāpta-koṇi*。(参阅 Emil Sieg, Wilhelm Siegling und Wilhelm Schulze, *Tocharische Grammatik*, § 363, a) 中间这个 *a* 有时候可以变长。譬如 *wās* 同 *yok* 合起来就成了 *wsā-yok*, *wāl* 同 *nkāt* 合起来就成了 *wlā-nkāt*。(同上 § 363, c) 依此类推,我们可以知道 *ptā* 的原字应该是 *pāt*; 据我的意思,这个 *pāt* 还清清楚楚地保留在 *ptānkāt* 的另一个写法 *pättānkāt* 里。就现在所发掘出来的残卷来看, *pāt* 这个字似乎没有单独用过。但是就上面所举出的那些例子来看,我们毫无疑问地可以构拟出这样一个字来的。我还疑心,这里这个元音没有什么作用,它只是代表一个更古的元音 *u*。

说 *ā* 代表一个更古的元音 *u*, 不是一个毫无依据的假设,我们有事实证明。在龟兹文(吐火罗文 B), 与焉耆文 *Ptānkāt* 相当的字是 *Pūdñakte*。[*Pudñakte*, *pudñikte*, 见 Sylvain Lévi, *Fragments des Textes Koutchéens*, Paris 1933: *Udānavarga*, (5) a2; *Udānālamkāra*, (1) a3; b1, 4; (4) a4; b1, 3; *Karmavibhaṅga*, (3) b1; (8) a2, 3; (9) a4; b1, 4; (10) a1; (11) b3] 我们毫无疑问地可以把这个组合字分拆开来,第一个字是 *pūd* 或 *pud*, 第二个字是

näkte. pūd 或 pud 就正相当焉耆文的 pāt。在许多地方吐火罗文 B (龟兹文) 都显出比吐火罗文 A (焉耆文) 老, 所以由 pūd 或 pud 变成 pāt, 再由 pāt 演变成 ptā, 这个过程虽然是我们构拟的, 但一点也不牵强, 我相信, 这不会离事实太远。

上面绕的弯子似乎有点太大了, 但实际上却一步也没有离开本题。我只是想证明: 梵文的 Buddha, 到了龟兹文变成了 pūd 或 pud, 到了焉耆文变成了 pāt, 而我们中文里面的“佛”字就是从 pūd、pud (或 pāt) 译过来的。“佛”并不是像一般人相信的是“佛陀”的省略。再就后汉三国时的文献来看, “佛”这个名词的成立, 实在先于“佛陀”。在“佛”这一名词出现以前, 我们没找到“佛陀”这个名词。所以我们毋宁说, “佛陀”是“佛”的加长, 不能说“佛”是“佛陀”的省略。

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佛”字古音 but 是浊音, 吐火罗文的 pūd、pud 或 pāt 都是清音。为什么中文佛典的译者会用一个浊音来译一个外来的清音? 这个问题倘不能解决, 似乎就要影响到我们整个的论断。有的人或者说: “佛”这个名词的来源大概不是吐火罗文, 而是另外一种浊音较多的古代西域语言。我以为, 这怀疑根本不能成立。在我们截止到现在所发现的古代西域语言里, 与梵文 Buddha 相当的字没有一个可以是中文“佛”字的来源的。在康居语里, 梵文 Buddha 变成 pwty 或 pwtty (见 Robert Gauthiot, *Le Sūtra du religieux Ongles-Longs*, Paris 1912, p.3)。在阐语里, 早期的经典用 balysa 来译梵文的 Buddha 和 Bhagavat, 较晚的经典里, 用 ḥaysa, 或 ḥeysa (见 Sten Konow, *Saka Studies*, Oslo Etnografiske Museum Bulletin 5, Oslo 1932, p.121; A.F.Rudolf Hoernle,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Vol.1, Oxford 1916, p.239、242)。至于组合字 (samāsa) 像 buddhakṣetra 则往往保留原字。只有回纥